

文革博物馆专集（五）

该会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迄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场曾经影响到每个中国人命运、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史进程的二十世纪空前绝后的重大事件，这段由无数中国人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走过来的历史路程，不应该、也不可能被遗忘。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文革三十周年之际，重评文革

，总结经验，将有助于中国人更清醒地迎接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

该学会发言人阿陀表示，由于目前大陆、香港和台湾各自特殊的客观情势，文革这段重要历史正在有意无意被忽略，这是极其令人痛心和忧心的。忘记过去的民族不会有未来。有鉴于此，我们一群生活在美国、关心祖国命运的中国人走到一起，回顾探讨文革历史，以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文革史料收集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纪念在大时代的动荡中，无法掌握自己命运而不幸丧生的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人；纪念当年那些追求真理，思想超越时代局限而英勇献身的中国人吧。

据介绍，该学会完全是民间自发性质，没有任何政治党派团体背景，研讨活动也不预设任何立场，并主张从多种不同角度去探讨思考文革。该学会计划于近期内在芝加哥华埠图书馆联合举办“文革三十周年纪念会。”

会议将就下列三个议题组织专题演讲及讨论：

- 一、 为什么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好”时期爆发文化大革命？
- 二、 怎样认识文革中的两派群众组织？
- 三、 重评文革意义何在？

欢迎各界人士自由参加，联络电话：（312）321—8289
Email: Kuochun_Yu@notes.pw.com

∞ ∞ ∞ ∞ ∞ ∞ ∞ ∞ ∞ ∞

舒解文革情结，回顾历史进程

三月十六日，美中文革学会的首次公开组织的“文革三十周年历史回顾座谈会”于芝加哥南华埠图书馆举行。会议为时两个半小时，约三十多人参与了会议的座谈。与会者有人文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商人，台湾人士，家庭妇女和退休老华侨。他们大部分是亲身经历文革的过来人，或从事社会科学的学人。

会场正中红黑两色的大字“文革三十年历史回顾座谈会”赫然入目，会场的墙壁一列悬挂着文革产生历史事件图和有关的图片。会议还为与会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会议议程分三部分：介绍文革学会；回顾文革发生的历史；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

会议由阿陀主持。会议先由梁子简介了学会本身产生的原因及其宗旨。

学会于二月二十四日在芝加哥成立。其成员来自各阶层，都是关心或经历过这场事件的人。

产生过程面临的困难：一、学会成员生活方面有谋生的压力；二、学会本身有生存的压力，因是业余性质，没有任何资金，会员都是义务为学会工作，并无偿提供物质上的支援；三、就是精神上的困扰。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里面牵涉的问题很多。我们还没有开会前，就有些好心人发出忠告，小心，别碰这个话题。其实这种好心的忠告里包含着一个预设的而片面的前提。即，搞文革研究就是搞政治，搞政治就是危险。应该澄清的是，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包含有政治学因素，但我们仅仅是研究这一段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含有政治学因素的历史，而不是在从事政治活动。

我们仅只是试图进行历史研究。我们的宗旨已表明我们的学术活动不预设任何立场。不存在翻案与否的问题。

尽管我们受到种种压力，但我们还是坚持搞下来。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动机的话，那么最基本也是最共同的动机就是，文革是二十世纪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空前绝后的重大事件，是无数中国人，包括我们自己付出沉重代价走过来的历史路程。文革研究长期以来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应该以健康，积极的态度去总结文革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会议主持人阿陀说，搞这个活动也有纪念的意思。文革中死去的无辜的老百姓有很多。刘少奇有人纪念。这些无辜的人我们要纪念。还有就是那些思想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文革这么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现在正被人逐渐淡忘，这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一位参加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活动的组织工作的华侨认为：对诸君的义务为纪念文革而出力的举动很感动。他们搞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也有很多困难，所以他很理解学会的处境。他认识的人当中应有十几位会来，由于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牵涉进文革。但他们都因或是生计的压力，或是不想再提起而没有来。说明人们正在忘记文革。这个活动很重要。可以定期的搞。

文革时期的老三届，原广州某中学学生说，看了报纸登有文革座谈会的消息后，就叫有关的朋友都来，但朋友们有的没时间，叫她听了回去转达。有的是不想再挖这个伤疤，太疼了。有的说她多事。这说明文革正在被遗忘。她回想起文革，那个时代结下的友谊，是现在这个和平、富足的时代所产生的人际关系所不能代替的。她今天参加这个会议，不是为了什么。而是难以忘怀那个失去了她最宝贵的时间和青春的年代。

大陆一旅美历史教授说，很高兴参加这个会，在大陆是不可能参加这样一个座谈会的。

当会议进入第二个议程，回顾文革发生的历史时，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目击者，当时的北大数学系一位学生回顾了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前后经过。他说，文革六四年底六五年初就有苗头。陆平（当时北大校长）说现在形势很严重，搞不好要上山打游击。他说工农兵大学生是粗瓷陋碗。针对这种看法，聂元梓就说教育路线有问题。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授意聂写大字报的。而她是通上面的。聂是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

六六年五四北大校庆陆平出面。他很久没有出来了。五一六指示只传达到上层。连党员都不知道。五月二十五日北大东南墙就贴出来了第一张大字报，起草人有哲学系杨克明，聂元梓等。中文系等知道一点情况的就出来游行了，生物系也是。那时北京市委已改组。二十五日晚大字报给撕了。突变是六月一日新闻广播了这张大字报，没头没尾的说，“现在开始广播一张大字报”，连按语也没有。听后学生就轰起来了。当时我们在昌平，就连夜步行回北大，见各单位敲锣打鼓到北大，人山人海的。

六月一日晚，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陆平是反党分子，聂元梓是左派”。这样聂等就被肯定了。当时还没有人搞人身攻击，只是对学阀，没有对老师，对反动权威的。这是指六月三日到六月十八日期间。当时矛头是指向党总支，对教育路线的。

六月十八日，工作组失控，实际上没有预谋。有人抓了一个反动权威来斗。

工作组利用六一八事件，说斗了好人，把斗人的人抓起来，说是反革命事件，学校的秩序开始走上正轨。七月，地质地理系贴出“工作组要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的大字报，引起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七月二十九日，刘邓接见红卫兵，被接见的人是每校的第一个系第一个班，数学系是第一个系，所以我们也去了。当时刘少奇正在接见，但毛突然走出来，把刘撇在一边，不理睬，刘十分尴尬。当时大家已感到很不平常。

回顾文革的发生，文革的火被毛点燃起来了，但为什么一下子就得到全国的一致反应？后来自己下放到一个很偏僻的，生产力和文化程度极落后的农村，那里也有文革，说明文革的普及程度很大。文革是过去了。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歌一唱，那个年代就会回到眼前，而永远都不能忘记。

一些地方上的文革参与者也回顾了本单位文革发生的情况。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文革一开始就有反对单位党领导或保卫党领导的斗争。

文革学会古月制作了大型文革史挂图，并亲自作讲解，引起与会者莫大兴趣。

文革学会的李立（中国留学生）、文革学会的阿陀和其他与会者还就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专题发言。

◇李立：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关系很紧密、直接。文革的来源、理论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要从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来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以党中央八一年《决议》为代表的主流文革史学承认毛泽东在文革事件中的中心地位。文革发生的原因被归结为主要有三点：一、毛泽东试图以他的“极左”思想、“僵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来改造中国；在文革发动前夕，对当时的形势，包括党内出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有发生政变的危险等等，做出了的错误估计。二、由于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听不得批评；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毛泽东的专断独裁，使正确的党的集体领导无法阻止毛泽东的“乱来”。三、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出于自己的个人野心参与发动了文革。因此，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野心家利用的一场大动乱、大灾难。”

然而，这些解释也提出了新的一些尚未回答的问题。首先，笼统地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极左”思想，很难说明问题；在文革开始后，两个对立的方面，从中央的两个司令部，到社会上的两大群众派别，都认为并宣称自己是革命的一方，而认为对方是错误、落后乃至反动的一方。从搞形式上的“极左”（也就是所谓的形“左”实右）方面来说，作为“走资派”的刘邓集团和主要由党团积极分子和出身好的人组成的“保守派”可能搞得更多一些。文革斗争，从某种角度讲，已经不是左和右的斗争，而是两种不同的“左”的之间的斗争。第二，用个人崇拜和毛泽东的专断独裁也无法说明文革的发生。因为，在文革发生的前夕，也正是毛泽东退居二线、毛泽东的实际权力下降至最低点的时刻。若讲独裁，当时的情况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彭真、陶铸等人垄断地方。第三，文革发生是被野心家利用的说法，也不能完全准确地概括当时的情况。在文革刚开始时，由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以及地方和基层的党委对运动方向采取了很大的控制，也深深地影响了文革中派别的形成和后来运动发展的走向。他们所起的初始作用，恐怕比后来“野心家”

们起的作用要大。另外，只注意精英层面上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范围内的潜在矛盾和冲突，也不能全面理解文革为什么发生。

这里，为了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提出几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首先，是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渐渐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和“继续革命”的特异思想。第二，应以现代政治学的观点，而不是宫廷野史的方法来分析毛泽东和党内官僚派的权力基础。三，在文革前的一系列先行运动中，运动的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斗争的矛头也渐渐地从对准前剥削阶级，转向新生的敌人，如党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在这些先行运动中，毛泽东的“左倾”的“发动群众”、“由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总被刘少奇接过来，转变成“内外有别”、“由上而下”的形“左”实右的运动方法。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个斗争，直到文革爆发，才见分晓。

六十年代以后，中苏论战造成了国际与国内斗争的交织；毛泽东在“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社会主义的方向等问题上，在思想上作了从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渐渐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和“继续革命”的特异思想。这个“极左”思想，和反右、大跃进的中的“极左”有重大区别：其关心的领域已经从经济转向政治，所注重的对象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比较而言，毛泽东六十年代的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很不乐观的。

◇阿陀：

毛童年的抱负是建立一个平等的国家。49年2月七届二中全会预想的国家蓝图——共产党领导的各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非西方议会民主，也有别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政体：“言官”监督下的共产党政权。

毛想走第三条道路，但打江山者坐江山是自古传统。建国后中共走向苏联体制。这种体制的通病是衍生官僚主义。而中国更甚，苏联毕竟是精英治国，中国掌权的是工农兵，和精英必然产生矛盾。斯大林死后，国际大气候下，这种冲突公开化了。

对斯大林体制的否定正合毛意。且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官僚化，日渐丧失夺权时的生气，迟早会变成和人民对立的特权阶层，有违毛的平等初衷。

五七年鸣放，毛利用“言官”炮轰执政党。就斗争矛头指向执政党本身这一点而言，鸣放（四大）是文革预演。毛原意不是“引蛇出洞”。但他对知识分子——依附皮上的“毛”始终怀有戒心，不相信。加上抛出试探气球碰到强硬的抵抗。他转舵倒向刘、周体制，并掌握主动。

刘、邓、周意识到上下结合的这种反体制力量的挑战。八大确立刘路线，架空，排挤毛。毛成了带有在野色彩的反体制力量。毛急于有一个取代现存体制的现成模式。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毛“摸着石头过河”，建国近十年，才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出现的“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五斗米教”中找到灵感。“不患寡，唯患不均”。历代农民起义目标都是均贫富。

人民公社虽然在大跃进运动中很快暴露出不切实际的空想色彩，失败了（以致妥协维持的人民公社实质已改变），但毛并不承认失败。“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艰苦奋斗的大寨，大庆道路；人民战争思想武装的军队，是毛思想认识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毛用军事共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来保持党和国家的纯洁性——倒退的理想主义道路。

五七年反右之后，虽然还搞了个大跃进，毛基本上是从八大以后就退居二线。用井冈山的一套和刘、周的政府打游击。

一方面（六一年接见蒙哥马利及六五年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公开说自己快死了，已定好接班人是刘少奇。另一方面，六二年庐山会议及六五年重上井冈山，都是树旗帜，号召，集合反扑的力量。毛手里有军队，又强化了精神领袖的地位，用此二条对付刘“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官僚体制。

十年准备。终于在六六年发动文革。五七年是改造党，六六年是推翻，重建。

作为一个政治家，毛的魄力：在党的上升期就看到必然产生官僚特权，脱离人民（已为今天腐败所证实），并亲手摧毁自己一手创建的党和国家。毛的悲剧：一个农民的儿子摆脱不了农民起义的局限。

毛解决监督党的问题，不要真正采用民主手段，而是从古训，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发展出“斗私批修”。

解决国家体制问题，凭三国志等几本古书及江西延安根据地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他要建立的理想国（人民公社，大寨，五七道路等）已被证明是违反人民意愿的，违反历史潮流的。

不可否认，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极深的创伤，但它的影响不能用灾难，浩劫简单概括。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主要事件——两次大战及东西方阵营的对立，都随着本世纪的结束而成为被划上句号的历史。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们对新世纪的进程将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发生在一国范围内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二十年了。它留给世人的面貌始终很模糊，但它的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其最主要的作用是文革改变了中国人，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把中国推离了传统的航道。文革以后，中国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国，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不可否认，文革从思想上，精神上“解放”了中国人。

中国向何处去？好的方面，千年文明古国在经历了文革这场否定之否定，充满痛苦的脱胎换骨以后，浴火重生。君，臣，父，子的千年权威格局被人本位的重新发现所取代。中国人的创造力空前高涨。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儒家文明的振兴，将带动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文明重新出发，走向一个新的高峰。但是，“解放”一词和“释放”相去不远。释放的可能是巨龙，伟龙，也可能是孽龙，魔鬼。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成熟得能够承受这种“解放”？如果中华民族缺乏自我更新的再生能力，创造的同时，也可能会毁灭自己。

◇与会者对两个专题发言反应热烈。

一位大陆旅美历史学者说：刚才李立和阿陀对文革起因的解析都很有见地，很深刻。讨论中提到的为什么文革要从文化开始，其实文革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但从文化开始与中国国情有关。西欧的一些革命以宗教开始，因为他们有宗教传统，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政治革命。毛的最大贡献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土地改革等外国也有。毛的最大贡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至于为什么一下子就蔓延

开来，与舆论的准备有关。历次运动已为毛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而舆论准备是革命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台湾商人说：我是台湾来的。但觉得文革提出的理念对当年我们进行的保钓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文革所要追求的理念，如教育改革等，历史上都没发生过，对我们这些台湾来的人很有吸引力，在美国青年中也有共鸣，可惜试验失败。

电脑工程师马先生说：文革为什么发生，和当时弥漫全国的崇拜毛的宗教气氛有很大关系。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历史现象，如果没有毛，会不会有文革？

伊利诺州大学化学系一学生说：听了刚才的发言，说反右是毛的理想的实验，说文革还是这种实验，就把毛浪漫化了。这是受国内的崇毛热影响。毛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回事，不是实际经历文革的人，特别在海外，很易受迷惑。

纵观这次会议，除了着重回顾文革的历史，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等主要论题外，舒解文革情结，清理一些多年来理不清的思路与情绪，也是与会者涉及的话题。这透露了一个信息，即文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潜在的影响和留给世人的思考还远远没有被触及和挖掘出来。

□ t o n 3 @ q u a d s . u c h i c a g o . e d u
(x i a o x i t o n g 提供)

~~~~~

【我看文革】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你知道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吗？

对不少四十岁以上的人，“文革”是一个永难平复的情结，但对属于二十一世纪的新一代人，“文革”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以下是北京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家庭，父亲与女儿之间一段真实的对话。（父亲四十五岁，现在一文化单位任职。女儿十七岁，北京某中学高二文科学生。）

父：你的历史考试成绩在班里算是数一数二的了，我来考考你，你知道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吗？

女：……好像是有两个人给毛主席提意见，结果引起了误会，毛主席以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林彪借机表面上树立毛主席的威信，其实树立他自己……记不太清楚了。

父：那你来说说“四人帮”是谁？

女：这我知道，有江青、林彪、姚文元、还有一个好像叫“魏群”？

父：魏群是谁？

女：（大笑）魏群是四川全兴队的球星，踢后卫的，可能他与“四人帮”里的一个人重名。

父：扣分！你这个历史是怎么学的？

女：关于“文革”的内容，学校政治课讲了一点，可是根本不考试。不过关于

“文革”的书我还真看过一些，电影电视里也演过不少嘛。

父：你知道什么是八个“革命样板戏”？

女：说不全，但我知道有一个戏的内容是一个人住在深山里穿一身皮衣，是个打猎的。还有一个戏中有三个人，他们一边唱戏一边喝水。还有几个戏，名字叫《青春之歌》、《英雄儿女》、《红岩》……

父：“老三篇”指的是毛主席有名的三篇著作，你知道是哪几篇？

女：提示提示。

父：你们课本上也学过的。比如有一篇叫《纪念白求恩》。

女：那我知道。我们同学都说在上海申花队踢球的外籍球员高佳就是“白求恩”。另两篇文章是什么？

父：《愚公移山》。

女：《愚公移山》不是古时候的寓言么？我们学的古文，怎么成毛主席写的了？

父：《为人民服务》中写一个烧炭的战士叫张思德的，这你听说过么？

女：张思德？没听说过。

父：那时候很多老干部都被人诬陷为“走资派”，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女：对，这个知道，就是“走资本主义的派”。

父：不能得分。再问问你北京大学谁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三家村”指的是什么？什么是“九·一三”事件？三五百年前外国的历史你们贴在墙上，背了又背；二三十年前中国的历史你们却什么都不知道？

女：那我们知道的东西你们也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九·一三”事件，可不见得知道什么是“五·一九”事件，中国足球的“黑色三分钟”是什么？就是我们课堂上学的外语呀、电脑呀、拿来考你们，你们也肯定答不上来。

父：有人相信，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七八年又来一次”。如果真是再来一次“文化革命”，你觉得你和学校的同学们会不会去参加呢？

女：我绝对不会的，但我想可能还会有好多人去参加的。也许就是像今天的“追星族”，一个风潮来了，大家都跟着上。还有现在的广告，有些简直过分，可相信的人还是特别多。我妈就是，广告宣传什么她信什么，假冒伪劣的东西买了不少。

父：其实我们讲一点“文革”，只是希望你们这代人不要忘了过去的教训，别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

女：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问你们，我为什么没有见过爷爷和外公，你们回答说



等我长大再告诉我。现在我知道正是因为“文革”，使他们受到迫害，以致过早地离开我们。听说“文革”中有好多家庭，包括好多的和我们同样年龄的“知识青年”，都受过很多苦。老师讲课时也说过，“文革”这场折腾使我们的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开了几十年，耽误了一代人。我可不希望这样的“革命”重演。

□ 摘自《中国妇女报》 转载自 A C T

G u a n g x i n X u 输入

<G u a n g x i n \_ x u @ d f c i . h a r v a r d . e d u >

~~~~~【往事追忆】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阳光灿烂的日子？

周平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瞎子摸象”，它告诉人们，每个人都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观察世界，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观点截然不同。最近看到姜文先生描写文革的大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说的不错，对于军区大院的红五类，文化大革命的确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他的观点和感受，但是如果年青的朋友看了这部电影后，认为文化大革命很好玩，“阳光灿烂”，那倒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我借用姜先生的题目，讲一段发生在很久以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故事。

1964年，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科大的校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这世界是我们的！”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而且一下子把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份子。”

1967年元月一日出现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的署名“科大雄师战斗队”题为“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曾经是轰动北京城的大新闻。它就像一颗小小的流星，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了瞬间，就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而我和我的同伴却为此付出了十年的青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如花似锦的岁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而我的青春刚刚开始，就被扼杀了，被摧残了。

1966年十二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了那些“大毒草”，象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等等。觉得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道理，十六条规定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抓学生是违反十六条的。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同学讨论，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XX，近代物理系学生冯XX和我共同起草的，后来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于1967年元月一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我已经找不到了，我记得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讲话风：中央文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的对立，2．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见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

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元月五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发表的。因为我们的中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校内外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我那时真是太天真幼稚，也是太狂了。真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们这群书呆子，装了一脑袋数理化，读了一肚子古今中外名著，可对于政治斗争的知识却连幼儿园都没有毕业。在我那科学家的头脑里，文化大革命就象解一道数学方程，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理推下去，就会找到唯一的解。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个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规的逻辑和原理求解，而且它跟本就没有解。

元月十日，X X X组织抄了我们几个人的家。

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X X，冯X X，我，江X X，黄X X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

据说当时公安局抓我们是看我们的中字报口气那么大，以为我们有很硬的后台，要把我们的后台揪出来，审查来审查去，才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雄师骨干成员都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中字报是我们自己起草的，是我们自己干起来的，没有什么人指使我们，也没有后台。这就叫作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被关押的是哪个监狱，但我知道里面关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青的。那个把我带到女牢的女警察看着我挺惋惜地说：“这年纪轻轻的大学生就蹲了大牢，这辈子可惜了。”她这话当时我根本不明白，我还没有想将来的事，我想的是要当江姐。

那个女警察把一间牢门打开对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说：“小兵，我给你找个人作伴。”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个中学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两个小辫，她床上放着一件很高级的军呢大衣，看来还是个来头不小的高干子弟。她告诉我，她是八一中学红卫兵的头，也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成员，今年十七岁，爸爸是总参的，中将。我告诉她我是职员出身，爸爸是教师。“是知识份子？”她有些轻视地说。但当她听说我是雄师的，马上和我“哥们”起来。她说，你们胆子还真大，还敢写“中央文革向何处去？”我说，我现在也觉得这个标题有些不合适。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审讯我的时候，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提了点意见，是符合十六条的。按照科学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既然他们可以给国家主席和老师贴大字报，我们给中央文革贴一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多么幼稚可笑！）审讯人员问我是否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说不一分为二就不会有发展。他们问我是否说过林副主席讲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是不对的。我说任何事物都要发展，没有顶峰，任何真理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相对真理，马恩列斯毛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能说谁比谁高。他们还问我是否讲过“江青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爱哭。”这是我写在日记上的。现在的年青人看了一定会觉得这都是大实话，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都承认了。我看到审讯人员在不停的记，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经毁了自己。我那时真傻。

监狱的生活漫长而单调，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早晚各一个窝头一碗菜汤，中午两个窝头一碗菜。除了毛选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别的什么都不能看。每天看着太阳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渐渐消磨掉，饥饿，孤独，寂寞和恐惧动摇了我的勇气。我受不了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辈子呆在这里。我投降了。我学会了说谎，违心地

写检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早日出狱。

半年后，公安局把我们送回学校，交给X X X组织的专政队，接受群众监督批判。从监狱里出来的我完全变了个人。我从名牌大学生变成了“一小撮”，从科学的殿堂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么错了？为什么错？今后该怎么办？我找不到答案，觉得好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但他们远在天边，自身难保，那时除了我，我的一家都在新疆农场，爸爸在农场被监督劳动，刚刚动过乳腺癌手术的妈妈还要下地去割稻子，两个初中刚毕业的妹妹也下到农场劳动。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再为我担忧了。

我曾经想到过死，仅仅有一次。那是在马鞍山一铁厂，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马鞍山。化学系是在马鞍山。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在淮南煤矿，在合肥，在马鞍山，科大已经有几个老师和同学因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有的卧轨，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因为是“雄师头目”自然是批判重点，经常在夜里被拉出去提审，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还要没完没了的写检查，交代。

一天早晨，炼焦厂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6435班的小光也自杀了，我大吃一惊，她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大家相处了五年，这么年轻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心里一惊，很想到炼焦厂去看她最后一眼，但工宣队讲，谁也不许去。那天早上，张队长在大会上讲，她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她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那天上午的批判会就是让他们班上的人发言批判她，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只不过平常聊天时，说了江青几句话。而且说她在1966年十二月黑风中，支持雄师观点，同情雄师份子。当我听到有人在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口号时，我实在承受不了了。人都死了，还要怎么样呢？几年前当我们满怀着美好的理想一起跨进科大校门的时候，谁会想到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那天下午，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问题比她严重得多，张队长说，你们的性质都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这些大学生简直是太狂妄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还胆敢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胆敢反对林彪同志和江青同志。我说，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提了点意见。张队长大叫着说：“只是”，你还“只是”！象你这样的问题，要不是党的政策宽大，要不是看你们是青年学生，你早就该坐大牢判刑了，你还嘴硬，你还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写一份检查，明天准备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实，我们就再把你送进监狱专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学都睡觉了，我还在昏暗的灯下写检查。那时我们住在一铁厂炼铁炉旁的一个工棚里。七月的马鞍山，夜里，还有三十六、七度，但我还得穿着长裤和长衣，套上雨鞋，因为蚊子太多了。我的脸被蚊子盯了好几个大包，内衣都湿透了，我拿着笔楞楞地坐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个聪明文静的孩子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想起了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我一生头一次遇到我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这么惨，我听说她是从二楼跳下来的，头朝下，血和脑浆流了一地……。我简直不敢想象那可怖的场面，昨天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今天怎么就什么都知道了？人生怎么就这么短？

我走到门外，看到那漆黑的夜幕上点缀着无数的星星，我记得，安徒生的童话里讲，人死了后就升到天上，变成了一颗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颗最亮的，因为她是多么年轻美丽。她已经解脱了，而我还在没完没了的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么

过关？更不知道我的未来，象我这样有严重罪行的人，还会有什么未来？

工棚门口有一条铁路是送原料到高炉去的，每天夜里都有火车驶过。我闪过一个念头，只要我往铁轨上一躺，火车一过，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脱了。当这个念头一闪过，我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跑到水龙头，拿凉水把头浇湿，让自己清醒过来。我双手紧紧抓住水管，生怕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中国有九亿人呢，我死了算什么！我一死，工宣队会宣布我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我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其他的人只不过多了个饭后茶余的话题，然后被人忘记。而我的亲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的祥会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对他们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多么爱我，他们不能失去我，而我在这个世界上留恋的也就是他们了。只要我活着，就是对他们的安慰，最坏的结果，把我分配到新疆农场，就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亲人们度过一生。

我回到工棚里，钻进蚊帐里，汗水和着泪水，把枕头和席子都打湿了，迷迷糊糊的，直到天亮才睡着。

第二天，太阳依旧升起来，人们依旧生活着，谁也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而我却为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后怕。生命是多么可贵。连动物，花草都留恋生命，更何况人，无论如何，我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爱你的人，也为了你爱的人。许多年后我读到琼瑶的小说，她说过同样的话，我感到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

为了活着，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适应环境，我必需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气，我必须学会忍耐和服从。我知道，我的命运是掌握在工宣队的手里，今天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我必须顺着他们来。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已经适应大批判了，我是一个活靶子，X X X组织给我编了一本“现行反革命份子周平三反言论集”，我象被人耍弄的猴子，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周平”的牌子，从一个批判会揪到另一个批判会。好象我活着就是让人批判的，对于这些我已经麻木了，我已经对任何的批判没有了感觉，反正说什么都一样。

虽然我被迫讲了许多谎言，但我这个人良知还在，我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管怎么说，我不乱咬人，我不能无中生有。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伤害任何人。这事至今回忆起来，我问心无愧。

我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有我的祥，我那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亲人，我那给了我生活希望，陪我走过人生坎途的伴侣。那时同情我的人不少，但只有他有勇气来接受我，和我一起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后来别人问他怎么当时选择了我，他回答得简单而实在，他说，我真的觉得她很委屈，我不忍心看她一辈子受苦，我要保护她。在当时敢于选择我的男人真是要有不平常的勇气和不平常的胆量。他并不难找到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姑娘过平平常常的日子，他没有必要自找这个麻烦，自己背上这个包袱。劝他的人不少，但我们终于还是走到一起来了。我想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缘份。人生难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足矣。

毕业分配的时候，他被分到贵州，后来又到了安徽农场，而我被分到宁夏西吉县。工宣队故意这样做，想把我们永远分开，他们好残忍，他们连我这唯一的爱也要夺去，在他们看来象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有爱。但我是人，是个年轻的女人，我是多么需要爱。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645的许小昆同学（许先生现在纽约某国际组织任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因为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议论过江青而被列为全校第一号

批判对象。他当时也被分到了安徽农场。我怀着一线希望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交换一下。当时他也被整得很惨。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应下来，后来他替我去了宁夏西吉县，但工宣队仍然没有让我去安徽而让我去了河南。据说后来许小昆从宁夏调回了北京。如果有机会碰到他，我要谢谢他成全了我们一家人。

1970年分配在河南的大学生都到沉湖去劳动。在沉湖农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女生连有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份子，个子不高，思想反动。很少有人敢和我讲话。我总是被派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门冷风直接吹进来的地方，演样板戏时，总是让我演滦平，我的绰号就是“滦平”，别人叫我滦平。在农场，我拼命干活，很少讲话，我想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孽，求得人们的谅解。后来我明白了，我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辈子也赎不了，洗不掉。运动一来，我就会被拉出来批斗。我已经习惯了人们鄙视和冷漠的眼光。平时我总是忍让不和别人争吵，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和一个人吵起来，她不和我讲理，反而大叫起来：“你算什么东西，滦平。”我就再也不吭声了，但我的心在流血。我是多么卑谦，我没有羞耻感，没有自尊心。只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我要活着。

从农场分配的时候，自然我是被分到那最差的别人不愿去的地方。我的问题没有结论，没有帽子，但这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档案里塞满了材料，我就象生活在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时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于死地。祥从安徽农场出来时，其他同学分到了城市，工厂和科研单位，而他因为我则被分到安徽省临泉县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

1972年元月，他听说我要到驻马店报到，就冒着大雪，从杨集步行了五十几里到新蔡县乘汽车，比我先到了那里。当我们又重新见面时，我依偎在他那温暖的怀抱里痛哭了一大场，象要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倾泄出来。这些年来，我象一头受了重伤而无家可归的小羊，我是多么需要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肩膀来保护我。我感到有了依靠，象回到了家。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经过了那些恶梦般的日子，我们是多么渴望安安静静地生活，平平凡凡的幸福。

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

我生在重庆，长在北京，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从来也没有想到我要在农村安家。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科学院力学所的崔季平老师曾经向我们介绍过我们要学的专业：“物理力学”。他说，这门学科是钱学森教授在我国首次创立的。他的目标是要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去了解材料的宏观性质，这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学科，科大的学生是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好好学吧，将来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呢。在我的梦想里我们以后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学，或是原子弹，导弹基地。当我们欢送高年级同学毕业的时候，对于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弹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总怀着几分神秘和敬意，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去从事那崇高而神圣的事业。

可眼下，祥在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我又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小县城。从临泉县到西平县直线距离不太远，可没有直达汽车，他要步行到新蔡县乘汽车到驻马店再转火车到西平，当天都到不了。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

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一年后我们结了婚，祥也调到这个厂了，我们在这里安了家。

如果四人帮一直不垮台，春天迟迟不来，我们会在西平的小屋里平静地渡过我们的一生。我再也不想当科学家了，再也不想当居里夫人了。只要再也不提雄师，只要再也没有阶级斗争。

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沙帐，回想着往事，象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愁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拖累了祥，连累了孩子。

然而严冬终于过去，春天毕竟来的不算太迟。

1979年的某一天，我收到科大党委的通知去参加平反大会。在会场上见到不少老年和中年的老师，我大概算里面最年轻的了。看到他们我在想，我是不是很幸运呢？平反文件一个一个地念着，台下一片轻轻的抽泣声。

在会上，我接到了两份平反文件，下面是这两份文件的全文（因为没有得到这些朋友的允许，我将人名隐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件

校党字（79）第 79 号

关于周平同志平反的决定

周平同志，四川重庆市人，原我校6431班学生。

1966年底至1967年初，周平同志参加“雄师”群众组织，并贴出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老干部。1967年元月，“雄师”被定为反动组织，周平同志定为“雄师”骨干成员，以攻击中央文革的罪名于1967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拘留，遭到批斗。

经复查，周平同志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大字报是完全正确的。现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

中共中国科技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件

校党字（79）第 30 号

关于“雄师”群众组织的平反决定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我校教师XXX、学生周平、XXX等二十多位同志成立“雄师”群众组织，在校内贴出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大字报。

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以中央文革名义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本来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正常的民主权利，由于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X X X、周平、X X X、X X X、X X X等五同志遭到迫害，于1967年元月被拘留，批斗，因参加过“雄师”群众组织或同情“雄师”观点的X X X等二十四位同志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到审查批判。现决定：对“雄师”群众组织予以平反，对X X X、周平等二十九位同志予以恢复名誉，销毁与此有关材料，撤销因此事所作的结论。

中共中国科技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下面有二十九人的名单。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泪水把这张纸湿透了。我知道这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而且我知道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列在这名单上。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十几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7年元月十四日，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校园里逮捕了五个“雄师骨干份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上大叫：“抓人了！”许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人？这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僵持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是调来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才缓缓开出玉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凛冽的寒风中，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明月为证，天地为证，在场的几千个科大人为证，这是1967年元月十四日发生在玉泉路科大校园的真实的一幕，这是民心，民意，这是历史……。

我拿着这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办公室，一个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很高兴校党委对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我还有几点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讲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那个老人看我一本正经很认真的样子，觉得很好笑，就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说，受雄师问题牵连而受到迫害远远不止这二十九人，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雄师但因同情雄师观点或者元月十四日去拦车也受到了迫害，校党委也要为他们平反，我递给他一份名单，上面有我和祥所能回忆起来的人名单，我说据我了解，受“雄师”一案牵连，在科大，在清华，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专院校共有大约有上千人，他接过名单说，对于科大的人我们会尽快调查了解作出结论。对其他学校的人，他们自己会处理。

第三，受雄师一案牵连，我的八本日记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我的日记本归还给

我。他说，事隔那么多年，这些材料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

这八本日记本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日记，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他们让我把最重要的，有意义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写下来，长期地写下去，将来就是你的生命史。这些日记记录了我从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长足迹，记录了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和我的梦，这日记没有虚伪和掩饰，是我内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记却被整页整页的抄在大字报上供人们批判，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的内心世界会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想到我的日记会成为我的罪状，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了。现在我的日记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的青春，我的梦……都永远地消失了。

□ 寄于美国 维吉尼亚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 <end-cm@cnd.org>
本期 校对：若原（美国） <cm-col@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荣刚（美国） <e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月边（芬兰） <e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萧同（美国） <end-cord@cnd.org>
《CND》总编：温冰（加拿大） <e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 [132.249.229.100]：
pub/hxwz

（加拿大读者可用：[canada.cnd.org](ftp://cnd.org) [142.132.12.100]：
pub/cnd/hxwz）

（欧洲读者可用：[europe.cnd.org](ftp://cnd.org) [132.199.1.203]：
pub/doc/cnd/hxwz）

考访服务站（Gopher）：[cnd.org](http://www.cnd.org)（中文或英文目录）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本期编辑用软件：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来稿与日常编务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